

妇女研究学术报告集

(1998 年)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子学院图书馆

440

37

D040
87

说 明

这个学术报告集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国际学者的专题报告，记录了 1998 年初在美国加州大学圣格鲁斯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举行的“20 世纪中国的性别与工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外国学者的学术演讲，其中中国学者李银河、罗苏文、刘伯红、蔡一平、王政的学术报告，均因有专文专著而未收入本报告集。第二部分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人员近两年的部分专题研究报告，也是今年夏天我所举办的妇女研究系列学术讲座中的一部分。

我们呈献给大家这个论文集的目的，一是向大家汇报我所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二是向大家通报一些国际学术研究信息，诚望各方面学者关注这些研究议题，积极参与讨论，推动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1998 年 8 月 3 日

目 录

Gail Hershatter 简述欧美近年的中国妇女研究	1
Karen Offen 介绍欧洲妇女史	7
Marilyn Westercamp 讲美国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	12
Gail 介绍她的书《危险的愉悦——中国 20 世纪的卖淫业和现代性》	15
与 Judith Butler 和 Wendy Brown 的座谈	19
Lisa Rofel 谈三后（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24
Gayle Rubin 讲课	30
Lisa Rofel 讲课：社会性别与性、人类学中的社会性别与性	35
Emily 介绍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对女权主义的探讨	41
Carla Freccero：妇女在大众文化中的再表现	46
关于女职工下岗——再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	课题组 51
关于我国妇女发展状况的思考	丁 娟 66
妇女生育健康的研究与行动	萧 扬 92
当代女性口述史刍议	赵金平 102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女性价值观念变化的调查与思考	陈 方 104
非公有企业女工研究	蒋永萍、胡新颖、张艳霞 115

1月16日

我今天要很快地用扫描的方法把欧洲、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领域的发展非常快，两年半前，有人约我写了一篇介绍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的文章。这两年，新的著作大量产生并不断增加，只能非常快地讲一讲。我带来一些书。介绍的方法是把这些著作按照出版时期分成年代。有的作者可能在很多时期都有著作出版，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时期。去年的讲座中，我把它们分成三个时期，今年就分成四个时期了。我们三个人的著作，在第三代和第四代都出现了。还有第五代，现在正在大量地做博士论文，这里不详述了。

对于社会性别与妇女的研究，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些讲的可能在中国已有介绍。

第一代研究者的著述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革命为中国妇女做了什么？在第一代研究者中主要的是英国的妇女学者。因为英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英国学者得以较早地进入中国。最早的学者之一Elizabeth Croll, 1978年出版了《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她可以说是近年来西方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开山鼻祖。她企图探讨在中国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她发现这种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复杂的，有时是冲突的。她主要的观点是，1949年以前妇女是受压迫的，49年后得到了解放进步。她在分析中，用了很多“老词”，认为中国妇女解放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封建残余”，在这个意义上，她用了许多妇联和共产党的语言。她用的研究材料主要是妇女杂志和共产党的文件等。

还有一位是Delia Davin, 她1976年出版了《妇女和工作》(Women and Work)一书，主要论述共产党的路线与妇女的关系。如党让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看这条路线是怎么实现的，看40年代、50年代，在根据地党的路线是怎么变成妇女的行动的。她是第一个在英文著作中指出，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路线造成了妇女的“双重负担”。她也指出共产党在有些方面是成功的，如比较注意批判那种轻视妇女的思想。

同时，美国的学者也出了两本论文集，一本是Margery Wolf和Roxane Witke主编的《中国社会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另一本是Marilyn Young主编的《中国妇女——社会变化和女权主义的研究》(Women in China—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1973)。这些论文集中属于历史方面的较少。历史方面有，晚明刘冲的妇女思想、秋瑾、广东农村地区缫丝女工对婚姻的反抗。主要的思想还是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妇女解放的影响。其中只有一篇与其它文章不同，是人类学者Norma Diamond分析共产党革命和妇女运动的关系的。她不像其他学者那样，问共产党革命对妇女好还是不好？~~而是问共产党革命为什么看起来能够顺利实行的原因。~~认为，实际上合作化是按照男性家族体系和社会网络进行，~~这中合作化运动巩固了而不是瓦解了男性家族。~~

第一代的著作实际上是到70年代末。

第二代著作出现在80年代初期，这些研究著作提出的问题，都关系~~于中国妇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于阶级的这种革命到底为妇女做了些什么？如果第一代著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说法，认为阶级革命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性别和妇女的问题，第二代著作对此看法提出质疑，但第二代学者不认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持~~有疑义。实际上这些学者都是关注、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希望通过分析批评，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为女权主义所用的东西。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开放了，大量信息有了交流，许多资料外面可以看到，如，文革以后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国外都可以看到，对中国革命的不同看法也在延伸和扩大。因为80年代初的这些著作，其材料只能来源于在国外能看到的官方材料。如Judith Stacey不懂中文，只能看译成英文的材料，更多地只能看官方出版的材料。这些资料来源影响了她们的研究。

在80年代初这批著作中，最重要的是Kay Ann Johnson的著作《妇女、家庭和中国的农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1983)。这本书很不一般。第一，她的注意力主要在农村。第二，她主要的批评是，中国的革命中并没有关注父权制和父系家族的制度，妇女结婚时仍然嫁出去，婚姻结构依然依赖于父系制的家族制度。她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对家族问题没有适当注意，在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土改可以给妇女土地，但结婚后嫁给男方，不能带着土地走。另外，共产党可以给妇女政

治权力，培养妇女走上领导岗位。但是，妇女一旦出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原来建立的政治关系、权力关系全都没有了。第三，她批评共产党在婚姻方面的改革，一遇阻力就后退了。她的著作的局限性是由于资料的局限。比如，她没有办法到中国，所以她对婚姻法推广的研究比较简单化了，与实际的调查研究相差比较多。

Judith Stacey 的著作《父权制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83)。她考察20世纪初和五四时期对家庭的辩论，提出五四时期对家庭的辩论有两个线索。一是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批判，说它造成了不独立的人，要使中国强大，应建立起像西方那样的核心家庭；二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变动，广大农村因为经济原因，许多农民不能娶妻，大批农民不可能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养活不起而卖妻于儿女。所以他们的理想是怎么恢复家庭。这是两种对家庭危机的不同的看法，当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根据地后，面临的是农民对家庭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抛弃前者而迎合后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许多政策巩固了父系家庭制度。她的这个论点比较简单化，但有意思的是，她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进入农村以后就农民化了的想法。近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有这个看法，尽管他们不是搞婚姻家庭、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的，认为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

80年代出的第三本书是Phyllis Andors的《中国妇女的未完成的解放，1949-1980》(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1983)。这本书更多地讲了城市妇女的工作的情况。比较局限的是，那时她们只能看文字资料，不可能进行实地采访调查。

第三代比较杂乱，很难清晰地理出线索来，和第二代主要区别是，能够进入中国，可以做田野调查，可以直接查阅一些资料。

人类学者 Margery Wolf 的《被延迟的革命——当代中国妇女》(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85)，就是在1980-81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她在中国考察了5、6个地点(北京市、福建农村、绍兴市、扬州农村、山东农村、陕西)，50多个访谈。她是美国研究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她最早是研究台湾的。她跟Kay Ann Johnson一样，都是研究中国婚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的。她主要看妇女结婚以后在夫家的过程，建立了“子宫家庭”的概念。妇女到了夫家以后，怎样在自己周围，和儿子建立一种感情的联系。(Emily：尽管她不是研究共产党革命，但是也有相关的。当时有一种观念，说共产党革命把妇女由被压迫者变成积极参与的革命者。Wolf在对台湾的研究中指出，不是有一种突然的变化，而是妇女在自己原来的生活中有一种能动性。)(Lisa：Wolf从台湾妇女的生活调查中指出，尽管整个社会制度对妇女是压迫的，但在整个社会体制中，在家族体制、家庭体制中，她们开创了对自己有利的生活环境，发挥自己的权力和力量。一个是“子宫家庭”，通过生育来增加权力；另一个是在村落群体中开创一个空间，说闲话，闲言碎语，这成为妇女控制村落中男人行为的无形力量。她的研究说，妇女每天聚集在村头的井旁边，说闲话。)

Wolf80年代初到中国做实际研究时，遇到很多挫折，和官方打交道有极大的挫折感，她的书中有一半是在讲她调查中的挫折。在实际调查中，她发现，在和妇女谈话的过程中，政治的影响无处不在。一开口都是政治语言，男女平等什么的，都是官方的话语。这本书很多都是讲这方面的情况。她没有问，这些被采访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使用这些官方语言的。另外，当人家回答她，男女都平等了，她没有思考，回答者概念中的男女平等可能会和调查者的概念不一样。Wolf主要批评共产党没有把冲击父权制作为它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其它题目的冲击，把它放到一边。所以，书名叫做《延迟的革命》。关于妇女解放的议题从来没有被抛弃，但永远是推迟的。在她的观察中，确实观察到了很多现象，后来中国研究妇女问题的学者也谈到。比如，大量妇女参加劳动，但是她们总是集中在低工资、低待遇的行业；另外，她也指出了双重负担的问题。在农村，她也看到男女收入的不一样，男的工分高，女的工分低，差距非常大，男女分工中的差异。还有就是妇女污秽的概念。在调查中，她发现了这种观念在农村中普遍存在。她也观察到农村和城市不同的家庭关系，在农村，家长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比较严。农村中，“子宫家庭”还是很突出的，对儿子的控制影响着父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在城市中“子宫家庭”不明显，在好多家庭中觉得女儿很好，生了女儿很高兴，觉得女儿作用很大。她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和父权制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

第三代中也有关于历史的研究，不光是当代的研究。Emily和我的著作都是看女工的情况和作用。如果做自我批评的话，当时从思想上来看，主要关注的是把妇女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使在历史上被淹没的无形的妇女群体显现出来。反思以前的研究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表现、再现这种情况？另一个是，当时我们著作中的许多问题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社会变化理所当然由革命带来的，如我们俩，一个调查上海的纺织女工，一个调查天津的女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工人没有像她们应该的那样起来参加革命？以后我们才看到，为什么自己作为研究者要设想，工人一定要参加革命？Emily在《上海纱厂女工》(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1986) 这本书里提出, 压迫和剥削不一定直接带来积极的反抗的行动。在很多分析中指出, 籍贯在构成女工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女工并不像马克思分析的工人阶级的那个概念, 构成女工阶级身份认同的更重要的可能是籍贯。工人阶级的团结性, 女性主义所说的姐妹情谊, 构成这些东西的基础可能是籍贯。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时, 如要取得成功, 也要利用这种社会关系。Emily的发现, 对两个方面的定论进行挑战。一个是阶级的身份, 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 就有这个阶级的身份; 第二是对当时美国女权主义提出的普遍性的姐妹情谊挑战, 妇女并不因为身为女人就有社会性别认同。

我的天津工人调查《天津工人, 1900-1949》(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1986) 与Emily 上海工人调查的不同之处在于, 天津女工数量较少, 占工人的比例也小。运动也比较少, 不积极, 为什么? 在这些问题背后还是有一个模式, 以为她们应该积极。

Janice E. Stockard的《广东三角洲的女儿——中国南方的婚姻结构和经济战略, 1860-1930》(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1989) 一书, 采访了以前住在广东后来移居香港的女工。她发现19世纪末, 在广东三角洲有一种延迟的婚姻交易, 出嫁后并不马上嫁到男方家里去, 她把这与女性的经济作用联系起来, 在这一地区, 女性是非常有价值的劳动力, 对娘家的作用很大。以后又出现了“姊妹会”, 大家在一起结成了团体, 不结婚了。这本书的意义是, 谈到了地域性的差异。她还强调了女性劳动的价值。女权主义者看这本书时, 把它浪漫化了, 认为这种形式是女性反抗婚姻的一种积极的行动。作者提出不要把它浪漫化了, 认为它是娘家对女儿劳动的一种控制。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的《赋予中国革命性别——20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主义政治和民众运动》(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 in the 1920's. 1995), 是讲20年代共产党革命中的性别问题。这本书界乎于第三代和第四代之间, 95年出版, 但材料是80年代的。与其他的书不同的是, 以前研究妇女就是研究妇女, Christina的问题是, 如何把社会性别提到共产党的历史上来, 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在美国是独立的研究领域, 好象是男人的事情, 以前是没有社会性别角度的。Christina要把这个加进去。Kay Ann Johnson的研究认为, 历史上共产党的许多问题, 没有足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作为支持。Christina认为, 要看共产党的实践, 在实践中怎么做的。她主要看20年代党内的妇女, 及其与党外妇女的关系。她一个是看党内的男性在杂志上发表的主张妇女解放的文章。另外她也看党内的主要女的组织者, 如向警予。以前研究向警予的人分析, 批评她只是沿着阶级路线在工作。Christina不同意这个看法, 认为她对妇女运动有贡献。Christina提出另外一个有趣的论点是, 把党组织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当时那些处于文化边缘状态的青年反抗者, 年轻男女在婚姻上反抗传统, 是怎样聚集到共产党中来的。她的结论是, 共产党当时给那些处于亚文化状态的男女青年提供了重新改造社会结构的希望, 但最终党没有兑现, 实际上党还是对这些妇女实行了限制。她在描述妇女的窘迫时, 一方面讲了党的限制, 一方面也讲了妇女自己在认识上的局限, 很多东西没有加以质疑, 就很自然地接受了。

Emily和我的《个人的声音——80年代的中国妇女》(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1988) 一书, 想把社会性别引进当代妇女研究。我们考察了当时大众传媒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对性别问题的关注, 大量妇女的时装、时尚、婚姻、工作……收集了当时社会上大量的对社会性别问题的辩论、讨论,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希望把这些材料引进到教学中, 当时没有什么教材在教学中可用。另外出这本书, 我们还想探讨一些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 比如, 中国革命对妇女哪些问题解决了, 哪些问题延续下来了, 哪些问题重复地被提出来, 哪些被否定了, 比如“铁姑娘”, 我们在80年代看到了许多材料, 对于“铁姑娘”进行讽刺和嘲弄,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第四代更复杂一些, 可以分期为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的著作, 受到近来西方学术界很多争论的影响, 比如, 文化理论、再表现的理论, 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 看它与其它各种范畴的关系, 在知识界、学术界这些大争论大探讨中产生了第四代。

很难把第四代的著作放到某一个固定的范畴里面, 很难归纳。但是, 主要的主题可以看到。第一个主题是分析社会性别变化的内涵, 社会性别关系不是固定的, 持久不变的。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 探讨在中国, 社会性别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是怎么与其它范畴发生关系的, 怎么发生变化的。这一阶段和前面不一样, 以前关注的是把无形的变成有形的, 这一阶段比较关注社会性别的关系。男性化、女性化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是怎么形成的, 如何变化的? Tani Barlow的几篇论文是关于这方面的: 《妇女、国家、家庭》(Theorizing Woman: Funu, Guojia, Jiating)。她考察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对妇女的不同的称呼, 比如, 在晚清时, 妇女被看成完全是在家庭关系中

的女儿、妻子、母亲。那一时期女人处在家庭关系中各个位置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被概括为群体的。20世纪初,妇女成为更有意义的集体名词,这是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群体的需要把妇女调动起来,这就是妇女这个集合名词的产生。在20世纪初到1949年前,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新的词“女性”,与以往的在儒家文化中用亲族关系来界定女人的各个位置——妻子、女儿、母亲是完全对立的,抽象出“女性”这个词,来反对这种社会关系。她又分析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出现了“妇女”的概念。这个“妇女”不是女人的意思,而是国家建立起来的主体(state subject),是在国家话语中建立起来的主体。“妇女”这种称呼,就像“工人”、“青年”一样。她的主要论点是,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而是不断变化的。从界定亲属关系,到变成一种集合名词,在民族主义中建构起来的集体名词,而在共产党的语汇中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名词,成为共产党建构起来的国家的一个主体。社会性别是在不断变化的。

关于社会性别和其它的关系的探讨,就是Lisa Rofel关于杭州丝厂女工的研究,这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Lisa考察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以社会性别与工人这个范畴的关系来考察,社会性别与代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它的变化。对杭州丝厂女工的调查中,她看到不同代际的女工,如解放初、文革时期的、改革初期的不同代际的女工。如果你只用女工这个概念,就无法看到她们之间代际的很大差别。社会性别内涵对她们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作女人,作工人,在几代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内涵。国家在它的政策条文中也体现出对这些大范畴的想象和界定,工人、女人、女工。Lisa分析,从国家对这些范畴的想象,与在这些范畴中的人对这些范畴的认识和意义的变化不一样,这两者之间是怎么样磋商和较量的。Emily和我正在做的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时期妇女历史的研究,也是希望探讨不固定不稳定的这些范畴,各种范畴不固定的内涵。所有这些研究中,国家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国家在影响各种关系中的重要性。除了Barlow那篇文章特别强调国家的建构,我们三人的著作更注重看地区上的实际生活的妇女,怎样利用国家建立起来的这些范畴,在她每日的生活中是怎么对这些范畴进行了改变。也可以说第四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明确地从中心问题——共产党为妇女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从这个中心问题游离开了。

第四代的第二个主题是,继续把共产党的运动从中心移开,不再把它作为笼罩一切的范畴来研究。如王政讲述五四女权主义产生的新女性,特别是没有参加共产党的新女性的故事。希望看到更多的这样的著作,当然不是说只希望看到对共产党的批评,而是说以前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不同的故事。

第三个主题是,尽管国家政策不是主要针对社会性别的,但是研究中关注这些政策对社会性别的含义。1994年,Ellen R. Judd的《华北农村的社会性别和权力》(Gender and Power in Rural North China)一书,提出普通的农村妇女在改革时期是社会的动力。在80年代下半期,她考察了山东的三个村庄。走访了许多家庭,但她是与当地很多干部、官员一起采访的,所以有许多敏感问题不能问。比如说生育制度、计划生育的政策对妇女的影响。她在农村改革的初期就看到农业的女性化,男劳动力转移出去,女劳动力留在田间。她看到社会性别的界线在这种劳动变化的过程中,未婚的女性在田里干活,结了婚的女性也在田里干活。男性的劳动往往建立起一种户与户之间的社会网络,而女性的劳动却没有这种功能。在村子里的政治经济权力机构中,女性是被排斥的。对资源的分配、采购、供销,这些涉及到对每个村民的经济、家庭有关的事情,妇女是被排斥的。她还看到乡镇企业中未婚女青年的劳动,认为这些女青年的劳动被用作建立男性亲族为中心的乡村社区的资本。她也考察了当地妇联,在推动当地妇女参加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作用。她也考察了在致富的专业户中,女性的劳动是非常关键的,但即使这样,女性的劳动在专业户中也没有成为建立起户与户之间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在农村里,建立起户与户之间的关系,就涉及到在村子里这个群体权力的问题。在这个权力的关系过程中,女性是被排斥的。不是说,妇女嫁出去了,就没有这种权力的基础了,就是留在村子里,她的劳动也没有和权力的过程发生关系。她的结论是,尽管妇女在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中是起了很大能动作用的一支力量,但这个群体并没有自觉地具有一种妇女的群体意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没有有意识地去获取她们应相应获得的权力。她基本的观点是,尽管在农村改革中没有人去谈社会性别的问题,没有有意识地看这个问题,但社会性别却是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照相扫描一样,只能抓住历史的瞬间,所以书中描写的许多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如,没有讲到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流入,这些对女性在村子里的权力到底有什么影响,当时她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现象。

第四个方面的主题,是看社会性别与性(sexuality)的关系,去重新界定中国的现代性。我的研究《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卖淫和现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要说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是通过社会性别、性、性文化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这些讨论并不是80年代90年代才产生,而在本世纪初就有了。这本书谈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前的方法是把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现在对这个提法,认识更深化了。就是说,看到了“再表现”这个方法存在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的问题。我们以前的女权主义学者,希望把无形的变成有形的,从历史的资料中发掘、发现妇女的生活、妇女的形象。比如说,妓女是被淹没的,需要去发掘她。但问题是,留下的

资料都是别人谈妓女，而不是妓女自己讲自己。这就是一个再表现的问题。就是说，留下的关于妓女的资料都是别人“再表现”的东西。即使是妓女自己的声音，比如说你也可以有这种资料，在法庭里，妓女被抓了，警察来问了，这些记录都有的，能否说妓女说的这些话就是妓女自己的声音呢？也要看到，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她的声音讲述的故事，其实已经经过了媒介的层层筛选。即使你是直接采访，被采访者对你讲的话，也是经过层层筛选。所以，好象不存在一种直接挖掘的真实的東西。另外一个再表现的问题是，每个人说话时背后都有一个他所关注的大问题，说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背后是一个大问题。比如，我考察20世纪初，许多男性讨论妓女改造的问题，他的心中是与现代化这个大问题联系起来的，什么叫现代社会，妓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怎么表现是现代社会，要把大的背景搞清楚。比如，在Lisa对当代社会性文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来，当代社会各种人谈性的问题的时候，他是表达与现代性的关系，不是单纯地没有其它目的地谈论性，而是与大的话题，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有关系。

(Lisa: 从20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史中可以看出，在本世纪初，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主题是个人的主体性，如何来表现个人的主体性？新文化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突出这一点。当时那一代人体现个人的主体性是反对家庭，反对家庭制度对婚姻控制，个人的反抗，包括反对包办婚姻。这个关注一直持续，就是说你要体现独立的个人的主体性，才是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到了20世纪末，这种观念一直存在。20世纪末，怎么体现个人的主体性呢？这种体现跟性结合在一起。) 我的这本书也对照了当代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后，出现了大量的对性的探讨。很多人的看法是，原来没有这个东西，被压抑了，现在才有。我的看法是，从历史的脉络看，早就有，对性的这些讨论，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结合起来的。对性的讨论，是中国人探讨现代性的一种方式，一种表现。

英国学者Harriet Evens的《中国妇女和性》(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1997)，也是考察性这个问题的。她考察了两个时期，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到90年代。她发现，这两个时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说，对性的关注并不只是文革以后的情况，并不是以前一直被压抑，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是50年代已经有了，而且很多提法与90年代很相似，50年代很多小册子、杂志上都谈论性的问题，这时候谈性的问题，往往把妇女与维护性的道德联系起来，把性界定为与生育之间的关系。这本书的问题是，文革这一段是空白，因为无资料，作者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她只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50年代和文革后跳来跳去，中间这一段空出来了。比较这两个时期的不同，她看到5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生理性的方面，80年代到90年代更多地是在心理和文化上。相似之处在于，对男女在性活动中的位置，80年代与50年代主要的讲法是一致的，就是说男性的性欲是强的，在性关系中男性的作用是主导的，女性是被动的、从属的。男女是由于生理把他(她)们截然分为男性女性。在这样的描述中，强调女性的责任。男性的活跃的难以控制的动力，要由女性把它控制住，道德责任在女性身上，这样的研究也还是抓住了一个瞬间，一个部分。在现代社会变化这么大的情况下，她能观察到关于性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议论，并不是完全集中在某一点上，是非常分散的，各种讨论都有，而且对一代代年轻人来讲，从观念上的差异来说，大概两年就是一代，对性的看法不一样。它的空白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并不是说，她没有资料，没有写文革一段，文革时期就没有性的问题了。所以，现在Emily等人的工作，还有其它的研究，开始关注文革时期性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介绍的主要是20世纪的研究，其实还有许多关于晚清的、帝国制度晚期的研究大量涌现。Dorothy Ko的《闺塾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1994)，讲江南地区上层妇女的文化。这本书是很有争议的，因为作者是想表达一个非常大胆的宣言，就是强调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特别她把缠足作为妇女的能动性，所以，争议非常大。

Susan Mann的《珍贵的历史记录》(Precious Records, 1997)写18世纪妇女的生活。她与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男性学者有很大的争论。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是非常保守的，很多老男人控制着。有个男的讲，你可以搞中国妇女研究，搞20年代的，但19世纪以前的没法搞，因为没有关于妇女的资料。Susan Mann的书中说，你要是查清朝以前的历史，到处都是社会性别的墙壁，走哪儿撞哪儿，你们怎么会看不见。她说，如果你关注社会性别的话，那你就会看到，你们所研究的清代历史，宫廷史、政治史，到处都是社会性别的東西，你看到的因素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对这本书还没有什么反应，那些男学者一片寂静，鸦雀无声，现在还没有书评。

还有一本是Francesca Bray的《技术与性别——中国帝国晚期的双刃结构》(Technology and Gender—Fable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她对明清时期社会性别的研究，是从社会生活中讲社会性别，是一本新书。她原来在英国，现在在加州圣巴巴拉分校教书。她以前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汉代的农业技术)，然后她用社会性别角度就看到了其中的问题。这本书把妇女作为历史上的生产者，体现在3个不同的方面。一是看妇女怎么组织生活空间，二是纺织生产，三是生育技术。

我现在讲的是第四代的著作，可以预计还有第五代、第六代著作不断地出现。而且，以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妇女的著作有这样一条线，是从与中国学者互相的交流对话中产生的。

（另附Gail提供的书目，此处略。）

讨论：

问：研究的分期，如何定义？

答：第四阶段基本上是90年代的产物。

古代史或晚清史。受到后现代文化批判等一系列理论的影响。理论方面来讲，80-90年代有所不同。主要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社会性别当作一个范畴，这是90年代的一个特点。有各种不同的范畴，社会性别是其中之一。与各种范畴的交互关系。70-80年代的研究当时受到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很深。现在情况不是那么简单。

社会史的一些研究者也用社会性别概念。

教科书的编写：不能有一个很大的架子，我不愿自己去写，但愿别人去写。

刘伯红、蔡一平整理 98年4月

我的第一部著作是法国妇女史的，然后逐渐扩大到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Victorian Women)，最初是集体的合作。对比三个国家(英、法、美)妇女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状况，她们都经历了比较相同的变化，工业革命。看不同年龄的妇女，看女孩的生活、成年妇女的生活，既看她个人的生活，又看她的工作，有报酬的工作，还有无报酬的工作，凡是妇女的工作都考察。有一点像人类学的研究。妇女工作的概念就很广泛：从生育孩子，到家务劳动。这些妇女从工作开始，直到进入更广阔的政治领域，直到女权主义的政治斗争。最后一部分讲老年妇女，甚至还考察葬礼，男女不同的丧葬仪式，从生到死这个过程。

我们在70年代开始做这个事情。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料非常少，很缺乏。我们选择了3个国家，把法文的翻成英文，翻译过来后再进行不同国家的比较，非常有意思。我们这个项目就等于是妇女比较研究的开端。6个作者，3个编辑合作。在这个项目中，有一点比较缺乏的，这是一本社会史，其中少了女权主义思想和历史。

一直认为，妇女史就是社会史。Susan Bell也是我们所的研究者，她认为妇女史是社会史，但中间还少了一点政治层面。所以我们两个又编了这样一套书，两本的，名为《妇女、家庭和自由》(women, the family and freedom)，把政治层面和妇女的生活结合起来。在这本书中，把西方思想史过程中，关于妇女的这些争论，历史中的争论、史料中的争论收集起来，本来西方思想史中不研究这些，我们就研究这些，西方史中关于妇女的争论，把这些编了两本书。关于这本书的设想，主要突出的一点是争论。以前也有一些把关于妇女的讲话拎出来，放在关于女权主义思想史的发展中，好象是一条直线，没有展现出这些讨论的环境，我希望看到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强调争论、辩论。

在1983年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认为，在西方史中对妇女的大讨论、争论，是西方思想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项目后，我的思想集中在欧洲历史上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辩论，也可以叫女权主义思潮大讨论，既反映女权主义的，也反映反女权主义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我现在写的这本书《欧洲的女权主义史》。这本书从1700-1950年，到波伏娃的《第二性》问世结尾，早的追溯到1700年。这本书将于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论点很多，其中之一是说，女权主义的历史是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探讨的问题是，男人权力存在的问题以及从男人权力出发，把女人包含进去的问题。我还有一个发现是，在其他女权主义的研究中，说男人的权力和男性的界定，在西方的构成中是排斥女性的，不包含女性的。从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是相反的，男人这样界定起来的权力，男人的概念，是对于女人的界定的一种反应，不是它在它前面，而是说在它后面。

书中另外的一条线，是探讨了在欧洲历史上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两大思潮都是在欧洲产生的。我还分析、追踪了这两大思潮的发生，特别看到19世纪下半期的冲突。在19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思潮不是一个思潮，而是一种政治运动了，尤其是在第二国际形成以后，形成了政治运动，提出了一种等级制的方式，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放在前面，妇女的放在后面。这种谁先谁后等级制的提法，是第二国际政治运动以后开始的。我在这本书里还考察了独立的女权主义运动，也有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女权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女权主义运动，然后又考察女权主义在欧洲各种文化背景中，如，欧洲的宗教就很复杂，有天主教的、犹太教的，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中，女权主义是怎么发展的，它的不同的发展历程。我强调，在欧洲，女权主义好象是一个固定、整体的东西，其实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它的整个历程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的资料都是看已发表了的文章，报纸杂志，妇女报纸，妇女杂志，看了大量的妇女写的东西，既然以这个为研究资料，也就是假定说，我的研究中，还涉及到一个前提是，讨论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文字资料留下来。这就跟18世纪、1700年以后欧洲妇女教育程度的发展以及出版业的发达有关，大量的妇女可以写作，并且出版。所以，我的资料就可以表现这些。

欧洲的女权主义史，这个欧洲的概念是欧洲大陆，英国在边缘，我的比较是以法国为中心，主要是因为法国也确实确实是女权主义思潮发动的策源地，好多思潮都是从那发展起来的，而且又有法国大革命的推动，所以，我对法国的注意力比较多。其他国家，如周围的德国、波兰、奥地利、西班牙都包括进去了，欧洲的这些小国家也都包括进去了，我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在欧洲大陆上。

另一个线索探究的是女权主义和欧洲的民族主义发生了紧密的关系。这个研究发现，欧洲一些比较边缘的国家女权主义的发展都是跟民族主义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拉美、非洲好多国家也是这样的。当时，这可以说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我想我们现在对它的研究还非常少，还有大量的研究需要做。特别是，确实当时的妇女问题、女权主义思潮，好多国家是在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但这一部分并没有成为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个东西？没有把它表现出来，空白的地方还很多，特别是比较研究，在各种国际的思潮、在各个民族文化中怎么表现出来。

要写一本关于女权主义的历史，当然首先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来历史地界定女权主义这个词。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女权主义，怎么能把这个词用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这种社会现象。在这词没产生之前的社会现象，女权主义这个词出现是很晚的，但是关于妇女的问题、前面的这种思潮早就有了。我对自己的解决方法比较满意，如何来解释那么长一段时间里，妇女起来抗议、种种的行动、这种思潮，我找到了一种自己比较满意的解决方式。

关于个人的研究就介绍到这儿。下面介绍一下国际的妇女史研究学会这个组织的工作。

1987年，各国的一些妇女史学者建立了这个组织。在此之前，有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历史学家大会”，这个大会是每5年一次。第一次开会在意大利，是1989年。妇女史研究学会1987年成立时，是通过写信成立的。一个任务是筹办1989年国际妇女史研究会的大会，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来发掘世界各地妇女史的研究进展。89年代表会议上的论文，被编辑成一本论文集，有3位编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另一个是英国的，这本书1991年出版。第二版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可以包括进来。这本书讲理论，也讲方法，还介绍到那时为止的世界各地妇女研究的状况，内容很丰富。90、93、95年都召开了会议。这个组织还出版通讯。1998年6月30日-7月2日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会议。中国的齐文颖也是这个组织的一员。

下面介绍加拿大同行做的研究。加拿大学者经常感到她们被忽略了。《妇女史——社会性别分析》(women's history—gender analysis)是她们研究的一个成果，去年出版的。其实加拿大学者也做了很好的研究，她们对社会性别、妇女、阶级、种族、族裔这些关系，有她们很好的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有的人提出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有区别。我对这个提法有看法。我认为，两个都要做。不同的工具在你的研究中都需要用到，看你在研究哪个方面，侧重哪个方面。妇女史的研究方法、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方法，其实研究中都会涉及到，都会使用到。

讨论：

问：有没有一篇介绍欧洲妇女史的代表性文章？

答：这本书（指91年出版的《国际妇女史研讨会论文集》）没有讲整个欧洲的，但是介绍了欧洲各国家内本国妇女史的研究、发展。最好的是5集的一套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西方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编辑者是Michelle Perrot，用多种语言出版。5本书是根据年代来编的，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当代的。英文版是92-93年出版的。

问：能否介绍一下主要的妇女史研究杂志？

答：1989年创刊的《妇女史杂志》(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季刊、美国，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去年冬季的一期是Emily主编的中国妇女史专刊）；第二本是《社会性别和历史》(Gender and History)，也是1989年创刊，英国出版，编辑是美国和英国的，也是季刊，这本杂志对男性的建构也感兴趣，它的侧重点与《妇女史杂志》有一点不同，因为它是社会性别研究，所以对男性的建构、对社会性别在社会发展中的过程也感兴趣；第三本书是《妇女历史评论》(Women's History Review)，也在英国出版，比较小，一年3-4期，以英国为主，也介绍其它国家；还有一本书是妇女史研究的评论文章，专门评论在妇女研究领域里的学术著作，每月出一本，最新的妇女研究，不光是妇女史，包括各个领域的妇女研究《妇女研究评论》(Women's Review Books)。齐文颖老师那有这本书。

问：社会主义内部的女权运动怎么处理与阶级的关系？

答：这种关系处理得并不令人满意。我的研究发现，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把阶级放在妇女解放之上，这个论点是从1880年以后就在妇女问题的辩论中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潮代表对妇女的辩论。主要代表作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人，蔡特金也在里面，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对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就形成了一种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推翻私有制，然后才是妇女的解放。这些基本观点通过第三国际和俄国的革命，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就推开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毫无疑问地都接受了这一套强有力的东西，成为非常主导的东西，没有差别。我今天给你们的两篇文章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篇是我的，另一篇基本上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是一个美国男学者写的。这个影响一直存在。我的文章就想打破一直流传下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坚持的这个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东西。分析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就是社会主义思潮与女权主义的冲突在哪里。我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分析。当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政治运动时，这个冲突更为尖锐，怎么来争夺对象，涉及到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我都分析到了。在我的那本书里，有两篇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问：如果把阶级问题置于性别问题之上，那么，共产党内部的女权主义还能存在吗？

答：发出女权主义的声音很困难。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蔡特金，她在德国社会党中建立了一个妇女部，还有一个是柯伦泰，在俄国共产党中她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妇女工作部。这两个例子，她们两个都不叫自己是女权主义，而且别人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她们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但是她们做的事情确实是希望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为妇女打开空间，这个努力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努力又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为她们不能做跨越了界限的事情，总归有个界限在那。如果你越过界限，那些阵营中的老大哥们就会批评你了，就会说你很像女权主义者了。她不敢用女权主义这个词，也不希望人家老大哥们称她们为女权主义者，那就到了资产阶级那儿去了。还不希望人家称她们是分离主义者，如果你坚持你那一块，就被看成分离主义者，所以，也怕这个词。所以，她们的事情是非常有局限的，她们在这个阵营的努力不那么令人满意，非常困难，因为有好几条框框，有好多冲突在里面，她们怎么解决这些冲突，障碍阻力特别大。她们特别不希望人家把她们看作分离主义，特别要显示无产阶级阵营的团结，她们与男性保持团结，强调团结性。连对在这个阵营中搞妇女史的都有指责，是不是搞分离主义。所以我认为这是很成问题的。

问：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答：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在法国革命中也已经有表现，谁可以做法国公民？谁不能做？当时有好多争论。但最明显的是在19世纪末，涉及到族裔问题。芬兰从俄国统治下独立出来，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宗主国脱离关系。在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中，比如说芬兰、波兰、捷克这些国家，第一个问题是，女权主义思潮怎么在民族主义中产生的？女权主义提出妇女应该首先要受到教育，母亲向孩子传递语言，如果你要想保持我们自己族裔的语言的话，妇女要受到教育。最早期的这些女权主义的要求就体现在这样的争论中，论点是妇女作为公民，是文化的传授者，把妇女放在文化传授者的位置上，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文化就是我这个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授者就有政治意义了。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可以提出给妇女教育权，高等教育权，提倡女子的教育就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意大利也是，由几个小国，后来变成一个国家。还有希腊，从土耳其的统治下挣脱出来。整个欧洲19世纪的历史，好多小国家从大国挣脱出来，民族主义的思潮很强。一个主要的议题是说，妇女养育孩子不再是一种私人领域的事，而是具有国家的重要意义，因为这等于在培育下一代，为这个民族培育后代，给妇女的角色带来了政治含义。女权主义也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妇女在社会上进步的各种要求。另一个例子是乌克兰，乌克兰也有这种经历，从俄国的统治下分离出来。欧洲各国都做了关于自己国家的女权主义史的研究，这些国家的讨论都谈到了女权主义跟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些人争论，说女权主义是跨越国界的，但从历史上来看，女权主义又都是在每个国家的特定的情况下产生，而有非常具体的内容的，受到自己国界内的各种各样政治历史运动的影响，它的内容是具体的，在各国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问：妇女史、女权主义史和社会性别史的区别？

答：妇女史(women's history)，在英文中是有很多意思的，你可以说是对妇女的关注，把妇女作为焦点研究，也可以看成是“所有的”、只是妇女的，声称你所占有的东西，还有这样的含义。women's history和history of women在英文的意思是不同的(在中文中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history of women就是把妇女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但是women's history就有一种“宣称”，是“妇女的”历史。语法上不一样，语义也不一样。好象传递了两个概念、假定，一个是说，妇女是普遍的，是女人都可以在我们研究的历史里；另一个是说，妇女在此中。

社会性别史(gender history)，社会性别这个词就比较多地意味着考察男女两性的历史发展。我强调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有明显的截然不同。因为，你在做妇女史的时候，你是要考察两性关系，不是说可以孤立地来看，不应

该把两者截然分开。在《西方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这套丛书的前言中,写序的作者就说,这本书讲妇女史,但是我们不是光讲妇女,而是看两性关系发展的历史,但是在作者中,作者的角度是不同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有的可能光讲妇女的,有的可能是讲两性的关系。这里确实有所不同,有的是表现妇女、写妇女,有这样的写法。作者声称我们是搞两性研究的,我认为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欧洲的高等教育、学术范围里,在这样具体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说法,是说你们不要把把我们看成是分离的,好象跟其它的研究没关系,这是男女两性的,应该受到关注的。特别在法国背景下,法国高等院校有地位的男的都是有社会主义背景的,不把妇女研究放在心里。这本书的作者希望,引起有权威的男人来重视她们的研究。如果光称妇女,就把你放到一边去,所以,用两性的说法,是一种策略的说法,可以引起人家的重视。这实际上体现出背景上的一种政治斗争,学术界有大量的这种政治斗争。女权主义就一直在这样斗争,各种策略都在使用。这两种方法并没有截然分开。有的人这样想,但我认为是错误的。

女权主义史(feminism history),女权主义的史学者把社会性别作为焦点,更突出它的重要性,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它研究的对象是看社会性别这个轴,其它阶级、种族这些,它也涉及到,但不是它的焦点。也有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应灵活地看,在有些情况下,可能社会性别是主轴,在其它的情况下,阶级、种族是主轴,要看具体的情况。但不管什么情况,这些范畴不能丢开。哪个主,哪个次,要看具体的情况。

其他有些称为女权主义史学者的不同意我刚才的说法,女权主义都是把社会性别当主轴的。美国人什么东西都有不同意的。

问:关于女权主义的界定。

答:《社会史百科全书》中有我的定义,这本书中,女权主义这个词条是我写的。简短地说,女权主义第一个定义,女权主义是关注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从属的。我不用被压迫这个词,被压迫是一种个人的感受,你在从属的位置上,你可以不感受出来。我是讲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从属,对这个状况表示关注的,是女权主义的定义之一。

怎么来鉴定哪些是女权主义者:

(1)女权主义关注、重视妇女所说的、所做的,凡是妇女说的做的,都有价值。

(2)女权主义者看到的男女两性之间的问题不是属于个人的、私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体系、机构、制度种种的反映、表现。所以,女权主义要做的是,对这种社会体制、机构造成的两性的这种统治、从属关系这一切进行批评和改造。

(3)女权主义关注由于制度、体制而造成的两性间权力的不平衡,她们希望看到两性间权力的平衡。我们把这种权力的平衡称为公正和平等。核心是两性间权力的平衡和公正。

这3点是最重要的。在这几个最主要原则之下,你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阵营、思潮、运动,有不同的策略和具体做法,大家就很不相同了。在这里面,有的是强调关系型的女权主义,有的是强调个体型的女权主义。在不同社会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争论,不同的策略提出来,但把它归纳的话,基本上就是两大类。一种是强调关系型的,一种是强调个体型的。

关系型的:在探讨妇女问题时,关注妇女与其他人的关系,与男性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与社会其他的各个阶层的关系,它是把妇女放在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各种各样关系中来考察的。

个体型的:只是关注作为一个个体,与西方哲学中的自然规律有关,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个人权利很有关系,比如说一种独立的个体,好象跟其它社会的关系不是那么相关,个体型的女权主义关注在这点上。

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把人们引向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果。个体型的表现在争取平等权利上,以男性为模式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比较强调平等的权利。当然这个平等的权利、人的权利是以男性为模式的,以男性的权利为模式的。

关系型的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强有力的,一直到20世纪初。不是只有一种争取平等权利的个体主义的思潮。其实,关于关系型的探讨也是很多的。在欧洲,更多的是关系型的。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反映团体、社群型的行动。在欧洲大陆,关系型的比较突出一些,女权主义运作方式上强调男女在一起,共同解决社会的大环境,妇女的问题是在这个大环境中来解决。跟美国这条线差别比较明显。

给一个不是最好的例子。如,在美国,往往说“是我的权利”、“我的选票”、“我的平等”,我的、我的,保证女性个人在这方面平等的东西,比较强调、突出。在另一条线上,比较关注怎样建立一个团体的机构来跟男人的团体机构平衡的问题。用集体的行动,在体制上进行改变。还有一个例子,在法国的历史中,妇女有产假,同时在宪法中也是说男女平等。这种状况在美国就不行,在美国,如果你讲平等的话,就是绝对的两个人都一样,一个是平等的权利,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我就是单个的人,有这个平等的东西。

这是美国比较突出的一条线。公正的概念，不一定两个人什么都一样，而有一种平衡。平衡的例子，比如说，女的有产假，男的没产假，但在大的环境下这是一种平衡，是一种公正。在美国，这就难以实现。

问：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做妇女史也可能会有一种社会性别角度，分析两性的关系，两性的观念怎样来影响了妇女，但我如果做妇女史，我的重点、焦点、研究对象是妇女。是不是有些做社会性别史的，不侧重任何一个性别群体。只是看两性关系，对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侧重。我的问题是，在这种研究中，怎么来平衡阶级、种族这样一些关系？

答：在每个人的研究中，总归要有一个侧重点，像照相机的焦点一样，总归有个焦点，不可能太散。你的焦点聚在哪？总归有这样的课题。

刘伯红、蔡一平整理 1988年4月。

1月23日

今天我要讲两个既互相区分又有关联的领域，即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妇女史把妇女作为一个调查的群体和主体，社会性别史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这两个领域都直接与女权主义的政治有关。有的女权主义者直接看女权主义的历史。女权主义的历史有几本书，包括Nancy Colt的《现代女权主义的诞生》和Rosalund Rosenberg的《分离的领域》。这两本著作可以看作是思想史，探究女权主义思潮的诞生，也与政治运动、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绝大部分搞妇女史的女权主义学者，比我早一辈的学者的背景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从左派过来的。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背景比较强的学者，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表现妇女史方面的无力，另一方面在她们自己的研究中，又往往用马克思的分析范畴，如阶级的范畴。她们比较关注看阶级与性别，有时把妇女也看作一个阶级。她们比较关注的具体研究领域，是看妇女在福利国家中（因为马克思未讲到福利国家的情况）的情况，比如，要看文化霸权，被剥夺的最下层的阶级（在福利国家的工人）怎么来维持资本主义结构的。另一方面，这些女权主义学者主要是从对非洲和东南亚的研究中得出一个模式，就是分析父权制和生产方式。她们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批评是：即使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也有大量不平等存在。这个不平等几乎是可以通通过不平等的劳动来量化的。这些学者在她们的历史理论中都关注妇女的能动性，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在这个学术领域中最近也有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代表者是印度的Chandra Mohanty；另一个是在美国的有色人种女权主义学者，对前面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代表者是 Evelyn Higginbotham。这些学者挑战的背景比较复杂，一个背景来自她们对那些区域中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进行挑战，因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往往否定父权制对妇女的影响。第二方面的挑战，就是向西方女权主义忽视非白人妇女的历史、非西方妇女的历史的这种现象进行挑战。另外，在妇女史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争论，围绕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区别，认为妇女是关于社会方面的，应与思想、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倾向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而且还要看调查的对象、研究的主题，它当时的经历是什么，而不必人为地区分文化史和社会史。我的一个学生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它产生的背景有关，因为它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强盛并占主导地位时，有些女权主义学者想对这个大背景提出反抗，但是主要的影响还是这个大背景。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学者争论得那么厉害，都是用阶级路线斗争方法，受这个影响。

下面介绍女权主义历史研究具体关注的问题。

1、关于身体 (body)

对于身体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关于性文化建构中男女两性观念的构成关系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研究有两位重要学者。一个是男的，Thomas Lagvevr，还有Londa Schiebinger，他们研究对性的差异的科学建构的变化。最早的对身体建构的历史的研究，是从基督教禁欲的历史研究开始的，禁欲主义对身体的否定和忽略，引起了他们对身体这个历史的关注。这几个学者Peter Brown、Cavolyn Bynum，由对基督教禁欲的研究转到对身体历史的研究，所谓身体史就是人对身体认识的概念建构的历史。Cavolyn较早研究了身体和宗教对妇女的建构，从中世纪已经就开始了。他/她们关注的是对人的身体的所谓功能——吃、喝、性、愉悦、痛苦等——的变化了的看法。Cavolyn Bynum在她的研究中，她在理论上愿意接受后结构主义讲的，主体是由语言构成的，但她同时又接受语言也是对经验的反映。她反对把身体的痛苦、愉悦看成是普遍性的，并不认为所有的人对痛苦和愉悦的认识是一样的。身体是有历史的。所谓历史就是一种构成，不是自然的东西，而经历了文化变迁，观念上的变化。这个学者对中世纪的研究发现，身体是由语言构成。在这种构成中，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有物质性 (phycical)，这种看法限制了影响了女性去获得拯救和神圣性。基督教从古希腊文明中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灵与肉的对立，二元对立，灵是好的，肉不是好的。宗教对妇女起到了一种作用，把女性与物、肉、生理的这一面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人的构成的两个部分中的糟糕的一面、低级的一面与妇女联系起来。她认为基督教实际上在历史中把身体看得很重，如对耶稣的攻击，是对他身体的摧残、肉体的摧残，耶稣受难被钉了手掌。她认为，在基督教徒中，很多人说在他体验到神的奇迹时，手上会有伤痕留下来（实际上没有），体验到基督所受到的肉体上的折磨。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只有两个是男人，其余的都是女人。就是说，妇女肉体上与基督的联系更紧密。记录下来的只有两个是男的，一个是很久以前，一个在20世纪，其他全是妇女。她认为，妇女通过强调身体部分和精神结合的重要性，在宗教教会中来扩大自己的力量。

和影响，建立起自己的一支宗教力量。在对身体的研究中，现在强调身体也是文化社会的一种建构，而不是纯肉体的东西。

下面，我介绍一些学术成果，在大家对身体感兴趣10-15年前，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这些学者也谈到了唯物史观研究的一些方面，如，家庭结构，社会各种各样的体制，工作，劳动这些方面。他们也研究文化的建构，比如说，对男女两性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怎么把男女两性构造起来。他们希望了解所谓女性、男性特性的变化，怎么来理解这种变化。

下面介绍这方面研究的三个学者。一个是Carroll Smith Rosenberg，是研究美国史的，第二个是Mary Poovey，研究英国19世纪的，第三个是Mary Louise Roberts，研究法国20世纪初对身体建构的历史。在文化建构男女身体的大背景下，有一个分支，就是研究性的历史。这些研究既受福柯理论的影响，又对他进行批判否定。他们继承了福柯对性的一些范畴本质化的批判，比如说同性恋、异性恋这些范畴，批评他在研究中没有关注到社会性别的问题。他们对性表达经历的考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经历，第二个是性经历的意识建构。在这方面，就有关于心理分析的历史和性学的历史。还有研究怎么指称同性恋、异性恋的历史，最多的最有趣的是关于对情欲的研究。Cynthia Russett和Judith Walkowitz都是研究19世纪英国社会中对性文化的建构的。有一本书是Ann Wagner的《罗丹的名誉》，分析罗丹的雕塑都是裸体女人，分析他的情欲。在这样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的、艺术的还有文学批评的有趣的结合，本来是分离的，在这里结合起来了。在探讨情欲和性的构成历史的过程中，有好几个作者研究了女性的身体和国家这样的题目。如Lynn Hunt研究“色情与法国革命”。当时法国革命中反保皇党与革命派的激烈斗争，通过对路易十六的妻子裸体的表现，通过色情式的表现来反映这些党派的斗争，挖苦她的裸体。她是奥地利人，不是法国人，所以用反对外国女人的裸体，表达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还有研究色情行业、卖淫、性病等话题，如何与国家的健康联系起来。如Gail的研究，另外Lauva Engelstein研究20世纪初的俄国，也是从这方面来看与现代国家建立的关系。

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题目是“把身体作为战场”这个概念。在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中，看殖民时期殖民主义如何对妇女的身体进行实际的蹂躏和摧残，又在殖民主义的语言中怎么使用仇视妇女的语言。在对殖民主义时期的研究中，大家可以突出地看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往往用一种性化的语言，比如，像Edward Said研究的“东方主义”这个词，体现了对异国异性一种性化的语言，表达一种殖民者的带有情欲的幻想。最近的女权主义研究认为，在殖民主义过程中，词语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殖民主义确实是建筑在对女性身体的蹂躏上的。比较突出的是Steve Stern的研究，这本书研究了家庭暴力怎么维持了殖民主义对墨西哥的殖民统治。Ann Stoler在对东南亚的研究中，看妾的制度怎么被殖民者用来作为殖民统治的一种方法，研究殖民国家中的权力怎么通过客体化了的女性来表现。Ann Stoler和Martha Hodes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研究。后一个学者研究如何用带性的语言，实现殖民统治。在美国，大量的语言把黑人男性讲成是性的侵犯者，通过这种语言的建构，合理了白人对黑人的统治，建立起法律来限制黑人的行为，语言的建构合理了法律的建构。法律不是与实际的性的变化有关系，而是与白人统治者的恐惧有关系，与白人统治殖民社会中的不稳定的状况有关系。

把身体作为战场的研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生育这个领域。Smith Rosenberg写了关于19世纪以来的生育历史。

2、关于空间的研究

在社会性别历史研究中的另外一个领域是空间的历史，对空间的研究。这个研究要脱离以前那种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对立的研究。现在对空间的研究就是看家庭中的空间、社会中的空间、各种不同领域中的空间。她们研究空间是怎么界定的、怎么来利用的，怎么通过社会性别的语言和概念来界定、划分和利用。这种对空间的界定、用社会性别语言来界定，又如何限制了两性的活动。Mary Ryan的研究就是看所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线是怎么变动的，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把公共的领域建构起来怎么限定了妇女在中间的活动。她研究在公共领域中占的这个空间，比如说，在美国，百货公司的职员都是女性，是一个妇女的空间。她就看这个空间怎么成为了妇女的空间，然后又怎么支撑了经济的发展？对妇女自身又带来什么影响？把空间社会性别化了。还有学者Judith Wolkowitz有一篇关于“性的危险”的文章，指出空间是根据社会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化地建构起来的，研究不同的空间对男女两性不同的危险在哪里。还有就是对劳动的研究，看劳动分工中社会性别概念怎么起作用，哪些界定为男的劳动，哪些界定为女的劳动，在劳动中创造了性别化的空间对男女两性的限制。这中间还发展起一种对空间的文化的分析。一位学者Elizabeth Kowalsk-Wallance研究，从英国人喝茶的茶桌开始，分析英国的物质主义以及殖民主义是怎么发展的，对茶桌的联系很好，茶是从哪里来的，茶具是从哪里来的，和中国有关，看到了帝国发展和殖民地的商业关系。

3、阶级、性别、种族的交叉综合研究

把阶级、性别、种族交叉综合起来研究，看和整个社会中父权制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制度的关系。很多研究，如，研究非洲妇女历史的就用这个主题，阶级、性别、种族交叉分析，还有研究殖民主义、殖民地历史的理论中也用这个模式。最近有令人振奋的工作，就是研究在英国变成帝国的过程中，印度作为殖民地的历史怎么影响了宗主国的历史，怎么形成了社会性别化的对宗主国的社会性别化的影响。它的意义不是说英国的历史研究开始包括了有色人种，包括了殖民地国家，而是说对种族、阶级的分析是与社会性别分析交叉在一起的。最容易看到的是，种族的话语经常是带着性的色彩的。同样，社会性别话语又经常跟表达种族、阶级不平等的语言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要表现种族阶级的劣等，可以看到使用很多关于社会性别概念。

4、劳动与工作概念变化的研究

第一方面把妇女综合入劳动工人史。10年前，要是讲劳动工人史的话，都是讲男的。尽管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女工的比例相当大，但在以前的研究中把工作场地讲成全是男人的领地。这与许多工业国家的发展是不相似的，不仅女工比例相当大，而且女工一直积极参与了对资方的抵抗。在美国史上，女工在罢工史上形成了防御线，女工大量地参加了这样的抗议行动。还有消费者的抵制行动，这中间也大部分是妇女在参与。

第二个方面是看文化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在工人的运动中，关于文化方面，涉及到社会性别的观念性的东西，工人怎么来表达他们关于社会性别文化观念。很多的工人抵抗的语言，深深地扎根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中，工人抵抗的语言是通过社会性别观念来表达的。

第三方面的研究，提出要修正、改变对劳动的概念、定义，修正要包括无报酬的劳动，包括家庭作坊的劳动，最近研究还包括了农业的劳动。这些工作也研究了妇女的一些看不见的劳动，有很多无形的劳动。这些研究向工作的定义提出挑战。我们现在对工作的概念的理解其实是跟资本主义发展离不开的，资本主义把有报酬的劳动界定为工作，其它的劳动就不是工作。现在这些对妇女的无形的劳动的研究对现代人所说的工作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比如，一些从马克思主义背景出来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对马克思讲的生产方式、剩余价值提出批评，因为他的这些统计都是根据有工资报酬的、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进行的，提出在这之外，还有服务性的劳动，没有报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表现出来。他还是父权制的生产模式。

我今天讲的比较集中的是社会性别历史的发展，下面更多地讲一些妇女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继续发掘妇女的经历，大量的著作分布面很广。从罗斯福夫人这样有名的人，到中西部的非常没有名气的普通农妇的经历。直到最近，关于妇女史的研究还大量集中在美国 and 欧洲。最近这种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大量的是非欧美地区的妇女史研究，还有现代化早期历史研究。时间上范围上都有扩大。以前的研究完全集中在西方白人妇女为中心，现在的关注从那个方面转移了，转向其他的种族、阶级。新的历史学者对有色人种妇女、底层妇女、工人劳动妇女、贫困妇女更感兴趣。最近妇女史也从妇女在改革运动中的作用转移开来，特别是在美国史中，也许都写光了。现在的兴趣转向妇女与法律、妇女与国家、妇女与战争、妇女与宗教，也转向政治上不正确的妇女（incorrect women），比如说三K党中的女性、殖民者中的女殖民者。为什么研究这些所谓“反动”的妇女？因为学者们比较关注社会性别与种族等的关系，另一方面，把女权主义的理论更复杂一些。还有的研究那些坏女人（bad women），比如那些巫婆、传播异端邪说的、妓女、罪犯，更多地关注于妇女的文化与妇女的社群，继续寻找妇女的能动性，寻找妇女的声音，所以，在妇女史方面，传记还是很流行的。幸运的是，这些研究也在不断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化批评理论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者也受到大量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结果是，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交叉起来发展，你可以看到妇女史专业出来的研究生，既要注重研究妇女的经历，又注重关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文化构建的过程。研究生两方面的书都读。希望新一代不要像老的两派那样争论不休。

刘伯红、蔡一平整理 98年4月